

论孙毓修的陶学建树

刘中文

(哈尔滨师范大学 文学院,黑龙江 哈尔滨,150080)

【摘要】孙毓修不仅是近代学者、编译家、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,也是二十世纪早期的陶学家。孙毓修编撰的《陶渊明》是20世纪最早的陶学著作。他特别以少年儿童作为特殊阅读群体,第一次在陶学史上郑重地把陶渊明介绍给少年儿童,把陶公植入少年心中。孙本《陶渊明》体例简单明了,材料趣味盎然,语言自然流畅古朴浑厚,具备了少年读物最本质的特点。同时,孙本《陶渊明》对诸多陶学问题作了深入的探究,体现了鲜明的学术性。孙毓修认为,陶渊明的性情与人格兼涵儒道之精华,他是中国文化史上的“四君子”之一,陶酒之“醉尤不可及”,陶公教子则是切至的慈祥恺悌之怀。然而,浓重学术性淡化了孙本《陶渊明》的故事性,作为少年读物,其“成人本位”的色彩仍未脱尽。

【关键词】孙毓修;陶学;建树

【中图分类号】I206

【文献标识码】A

【文章编号】1671-6973(2015)02-0093-06

一、引言

黄庭坚曾说:“血气方刚时读此持,如嚼枯木。及绵历世事,知决定无所用智。每观此篇,如渴欲水,如欲寐得啜茗,如饥啖汤饼。今人亦有能同味者乎?但恐嚼不破耳。”^{[1]305}山谷之见信然。一般而言,少年难以读懂陶诗,因而让少年读懂陶诗也就成了陶学家面对的课题,孙毓修先生便肩负了这一使命。

孙毓修(1871—1923),江苏无锡人。“又名学修,字星如、恂儒,号留庵,笔名绿天翁、东吴旧孙、乐天居士、小绿天主人等。清同治十年六月二十九(1871年8月15日)出生于无锡城西开源乡孙巷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的家庭。”^{[2]2}早年攻读于江阴南菁书院,师从缪荃孙学版本学、目录学。1895年中秀才。1902年春“又到苏州上康桥美国牧师赖昂女士处学英文”^{[2]13}。1907年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,任高级编译。主编《童话》、《少年杂志》、《少年丛书》等儿童及通俗文艺读物,并为涵芬楼鉴别版本。1919年前后,孙毓修主持《四部丛刊》的辑印事宜,先后出版了《四部丛刊初编》、《四部丛刊续编》、《四

部丛刊三编》。著有《欧美小说丛谈》、《中国雕版源流考》、《永乐大典考》、《伊索寓言演义》,译有《北亚美利加洲》、《亚细亚洲》等著。

孙毓修是近代著名学者、编译家、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,也是中国儿童文学与少儿读物出版的创始人。1909年,孙毓修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了《少年杂志》,同时编撰了《童话》、《常识谈话》、《少年丛书》、《演义丛书》、《模范军人》和《新说书》等少年丛书。其编译和主撰的《童话》是中国最早出版的童话,标志着中国少儿读物出版和儿童文学的开端。曾与孙毓修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共事的茅盾先生称赞孙毓修为“中国有童话的开山祖师”^{[3]130}、“中国编辑儿童读物的第一人”^{[4]361}。《少年丛书》是一套介绍中外历史名人的读物,于1908年12月问世,共出版了三十册,其中十八册为孙毓修编纂。

孙毓修编纂《陶渊明》(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4月初版)即是《少年丛书》之一。该书是20世纪最早的专门介绍和研究陶渊明的著作^①,也是陶学史上第一部“少年读物”的《陶渊明》。孙毓修能将山谷道人所谓的“枯木”植入少年心中且化之为水、茗、汤饼,全在于他的匠心独运。

【收稿日期】2014-09-03

【作者简介】刘中文(1964—),男,黑龙江青冈人,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,文学博士。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、陶渊明研究等教学与科研工作。

二、孙毓修的陶学著作

孙毓修编纂的《陶渊明》(以下称“孙氏陶著”)1918年4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,32开本共33页,约一万三千字。除所引述的陶公八篇作品和颜延之《陶徵士诔·序》计约三千字外,孙毓修所著万言许。“提要勾玄”是本书所体现的原则,所谓“提要”即全书仅选取了统摄陶公一生的五柳自况、作令彭泽、重九醉菊、武陵寄意、训子、自挽“六事”来凸现陶公个性。所谓“勾玄”即由“六事”钩沉进而对诸多学术问题深入探究。如下两大特征使该书成为“另类陶著”。

(一) 以少年受众为中心布局谋篇

1、简单的体例

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拓荒者周作人认为,少年读物当“文章单纯、明了、匀整;思想真实、普遍;这条件便已完备了。”^{[5]279}孙氏陶著体例恰恰是单纯、明了。全书仅有总论、五柳自况、作令彭泽、重九醉菊、武陵寄意、训子、自挽七章。“总论”开宗明义,阐明自己的观点,对陶公予以文化剖析与定位。六章各记陶公一事,每章的结构都是:叙事——引述陶公诗文——讲解——批评。其“批评”为点睛之笔,揭示陶事的文化内涵,钩沉相关学术问题。而全书仅选取了陶公的“六事”来凸现陶公个性,正所谓记事简明。这样简单的体例确实便于少年阅读,体现了编纂者为少年“量身定做”的匠心。

2、有趣的材料

孙氏陶著的材料有三类。第一类材料是“陶作”。全书仅选陶公八篇作品,孙氏选取陶作或是少年耳熟能详的作品,如《五柳先生传》、《归去来兮辞》、《桃花源记》;或是与孩子的身份相关的作品,如《责子》、《与子俨等疏》;或是能够引发少年好奇心的作品,如《九日闲居》、《止酒》、《自祭文》、颜延之《陶徵士诔·序》。突显陶公的品性与人格是孙氏陶著的着眼点、立足点,而这九篇作品可为最佳选项。第二类是“陶事”。孙毓修所讲述的陶渊明的故事有做令彭泽、种秫酿酒、拒不折腰、解印去职、麾去檀道济、乘坐篮舆、与王宏共酌、重九坐菊、白衣人送酒、与颜延之酣饮、蓄无弦琴、入莲社事、自撰祭文,等等,其中多是家喻户晓的故事。故事所具有的浓郁的趣味性极容易唤起少年的兴趣,从

而抓住孩子们的好奇心,最终浸润、感化少年的心灵。第三类材料是“插图”。图文并茂是少儿读本最本质的、最核心的特征。孙氏陶著附有八幅插图:“靖节先生像”、“归去来兮图”、“乘篮舆图”、“白衣送酒图”、“武陵人入桃源图”、“庐山瞻云寺图”、“夫妻耕作图”、“陶渊明墓山图”。孙毓修在《童话·序》明确地阐述了加入插图的目的:“文字之浅深,卷帙之多寡,随集而异。盖随儿童之进步,以为吾书之进步焉。并加图画,以益其趣。”^{[2]358}插图的使用,自然唤起了少年的阅读兴趣,深化的阅读效果。而且这八幅插图趣味盎然,除“陶渊明墓山图”外都是写意画,插图以简洁的线条勾勒出画中人古朴、敦厚、恬淡、蔼然的神态,即便是成人看了,也会被画中人感染,并心驰神往进入图画中的境界。遗憾的编纂者未交待这八幅插图所从何来。

3、浅近的文言

周作人先生认为,儿童学上的少年期在十至十五岁^{[5]275}。少年期的孩子,一般都有国文阅读的经验,其阅读物“浅近的文言可以应用”^{[5]278}。由于旧学根柢深厚,孙毓修采用了“浅近的文言”编纂少年读物。“浅近”是因为读本的特殊阅读群体所决定的,必须以少年受众为中心。使用“文言”,一方面“文言”是国文的书面语,是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;另一方面,“文言”的使用也由《少年丛书》的题材所决定的。孙毓修撰写了《少年丛书》的十八种图书,着重选取在中国文化史上有重要贡献和影响的贤达,诸如陶渊明、玄奘、苏轼、司马光、朱熹、王阳明等,用庄重的文言书写古代贤达,更能体现出后人对他们的敬仰与崇拜之心。茅盾对儿童读本的语言问题特别强调:“现在我们所有的‘科学的儿童读物’大半不太注意‘文艺化’,叙述的文字太干燥,甚至有‘半文半白’,儿童读了会被催眠。”^{[4]362}孙毓修在儿童文学中所使用的“浅近的文言”是“浅显而纯熟的书面语”,并非茅盾所批评的半文半白语言。

孙氏陶著所撰近万言,无论叙事抑或议论,其“浅近的文言”自有其独特的语言风格。试读之:

当众人梦梦,举世滔滔之日,而无一人为树风节、明大义,为疾风知劲草、岁寒之松柏。则波流所届,伊于胡底?譬之于时,长夜漫漫而无旦时,天地之道亦将息矣,岂不危哉!乃知人类之赖有忠臣孝子贤人高士也,甚于粟米

① 二十世纪初的陶学著作,以出版时间排列依次是孙毓修《陶渊明》(商务印书馆1918年)、梁启超《陶渊明》(商务印书馆1923年)、胡怀琛《中国八大诗人·陶渊明》(商务印书馆1925年)、古直《陶靖节诗笺·陶靖节年谱》(中华书局1926)、傅东华《陶渊明诗·陶渊明年谱》(商务印书馆1927年)、胡怀琛《陶渊明的生活》(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版),等等。

水火之不可一日阙也!”^{[6]3}

渊明生当鼎革之秋,触目生愁,抚景增叹,无可奈何,则逃于酒。且犹夙兴夜寐,不敢怠荒,其醒不可及,其醉尤不可及,读者勿漫学之。马援曰:“画虎不成,反类其狗。”汉武帝曰:“不食马肝,未为不知味。”学古人者必先胸中有此鉴衡也。^{[6]18}

语言风格自然流畅、古朴浑厚、风骨端翔、浩气荡漾,犹得战国策士睥睨天下之怀、雄辩滔滔之气,又深味汉唐古文澎湃激荡、气势磅礴之风。读来心神朗朗、胸襟愈大、志节弥高。茅盾说孙毓修“瘦长个子,有点名士派头。”^{[8]124}除了坚实的国学根基外,孙毓修骨子里所透出的“名士”精神,正是其“陶著”语言风格形成的底蕴,这从其“少年丛书”的选材上也可略见一斑。“少年丛书”的选材着重选取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学者、文人,但策士、武将同样也在孙毓修的选材之列,诸如信陵君、苏秦、张良、马援、班超、诸葛亮、郭子仪、岳飞、文天祥等。无论是丛书的选材还是其“陶著”的风格,我们都能够从中认识到,由儒家的“固穷”精神和道家“任自然”的价值观所形成的“名节观”,抑或由墨家“任侠”观念所形成的“侠义”精神,早已深入孙毓修先生的骨髓,且时时奔流在他的血液里。孙氏陶著所体现的这种根植于中国文化本体的“风骨”和“浩气”,是中国文化的精髓,是中国文学之正脉,以此滋养、教化少年,其必有大器成焉。

(二) 对陶学问题的深刻思辨与探究

孙本《陶渊明》是写给少年的书,作者对陶渊明给予个性化解读与介绍的同时,也对陶渊明文化地位、陶酒、陶公教子、陶公家世、陶公祖父、陶公五子、陶集版本、陶墓等诸多陶学理论问题作了考证、探究,提出了自己的观点,体现了鲜明的学术性。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探究是孙氏陶著的核心内容。其思辨、论证较为深刻的陶学问题有如下几方面。

1. 论陶渊明的文化地位

孙氏陶著的《总论》可谓一篇陶学专门论文。孙毓修将“名节侠义”观作为理论立足点,由此出发从史学角度进入论题、展开论证。

朱熹《答刘子澄》论曰:“建安以后,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汉室……刚大直方之气,折于凶虐之余,而渐图所以全身就事之计。”^[7]孙毓修首先发挥朱子的观点提出:“名节侠义之风,莫盛于东汉。党锢诸贤,趋死不避,何其烈也。司马氏(篡国)……侠义之风,遂不复存。”^{[6]1}他批判晋世以来尚清谈、崇虚浮、贱名检、狭节信、鄙居正、笑勤恪、

“无一人焉树风节,明大义,为疾风知劲草,岁寒之松柏”^{[6]3}的恶浊世风,并激切地呼吁道:“长夜漫漫而无旦时,天地之道亦将息矣,岂不危哉!乃知人类之赖有忠臣孝子、贤人高士也,甚于粟米水火之不可一日阙也!”^{[6]3}

其次,孙毓修对隐士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给予充分肯定。“乱极之世,人才乃出。……亦有人焉,逼世若浼,逃名不出。高洁之行,天下皆望之。难言之痛,天下皆谅之。”^{[6]3}他认为,对于历史,隐士高洁之行有劝世之功,“百世之下,闻其风者,犹足使顽夫廉,懦夫有立志。”^{[6]3}且隐士之名节风概有不朽之德,“在当时虽不及名将名相,有特殊之功绩。而其为一代之典型,为万古之纲常,则非廊庙中人,所能及其万一也。”^{[6]3}在孙毓修看来,隐士虽不能救国,但可以以一己之洁身与绝世之高行来济世救俗。孙毓修进而把陶渊明与竹林诸贤作以对勘,最终透析出陶公的“忠义”来,“东晋之季,有陶渊明焉……今读其《饮酒》、《述酒》诸诗,则知陶公之托于麴蘖、逃于昏冥者,夫岂得与阮籍辈并论!……公乃高举远蹈,不受世纷,而至于躬耕乞食,其忠义亦足现矣。其退休所作诗,类多悼国伤时感讽之语,论者不察,与竹林诸狂士等量齐观,夫岂足与论古者哉!”^{[6]3-4}在孙毓修的价值体系中,陶公高于竹林名士之处全在于其“忠义”之心。

孙毓修进而提出全书的观点:“楚之屈大夫,韩之张司徒,汉之诸葛丞相,晋之陶徵士,是四君子者,其制行也不同,其遭时也不同,而其心一也。”^{[6]4}在孙毓修心中,屈原、张良、孔明、陶潜不仅是君子,也是千古义士。所谓“其心”即“四君子”至死不渝的“明君臣之义”,亦即于国于君的“忠义”之怀,这也是儒家所推崇的“君子”的核心品格。张良与孔明为国尽心,“略伸志愿者,其事业现于世。”^{[6]4}而屈原与陶潜俱不遇世,“将没世而莫知之,则不得不托之空言以泻忠愤。”^{[6]4}这不由得使孙毓修满含悲愤地为陶公悲鸣:“嗟乎,陶公无昭烈之可辅以图存,无高皇之可倚以复讎,乃终以高隐终也,悲夫!”

陶公确实未建功业于后世,但儒家所倡扬立德、立功、立言的“三不朽”,陶公已立德、立言,三有其二,自然如江河不废、万古不朽。以此观之,有何悲哉?若以道家价值观审视,陶公为“自然之子”^[8],“在中国文化史上,他是第一位心境与物境冥一的人。”^{[9]308}他实现了道家和玄学所主张的最高境界与理想——物我一体、浑融自然。以此观之,陶公更无“可悲”之理。陶公儒道双修,各臻其致。因而,中国古代士人无论圣贤、奸佞,无论仕进、退

隐,都对陶渊明仰目斗极、钦佩之至,不断地从他身上汲取自己所需要的生命智慧。陶公至性淳一,天姿贞素,不蹈其曾祖陶侃入世的旧辙,虽无名位功业,却已优入圣域,名垂青史,幸哉!孙毓修局限于儒家之所谓“功绩”一端而为陶公悲鸣,则大可不必。但无论如何,孙毓修“四君子”之论确实议论正大、识见卓绝,诚为陶学理论之一大建树。

2. 论陶渊明的品性与人格

作者心中仰慕的君子,其品性与人格自当是论证的核心问题。除《总论》外,孙氏陶著的每一章都从不同角度涉及到了这一核心问题。

首先,孙毓修认为陶公“素怀高洁”、“高尚之趣出于天性”^{[6]6}。有此人格底蕴,故其“高洁之行”体现在“公乃高举远蹈,不受世纷,而至于躬耕乞食,其忠义亦足现矣”^{[6]4}。他引述了颜真卿和朱熹的观点对此加以论证。

颜真卿是唐王朝义士,他被唐藩镇将领李希烈缢杀。其《咏陶渊明》诗云:“张良思报韩,龚胜耻事新。狙击不肯就,舍生悲缙绅。呜呼陶渊明,奕叶为晋臣。自以公相后,每怀宗国屯。题诗庚子岁,自谓羲皇人。手持《山海经》,头戴漉酒巾。兴逐孤云外,心随还鸟泯。”^{[10]1583}为此,朱熹慨叹道:“颜文忠公《栗里诗》(即《咏陶渊明》)……读之者亦足以识二公之心而著于君臣之义矣。”^[11]在颜真卿心目中,陶渊明忠于晋室一如张良报韩而刺嬴政、龚胜效汉而拒王莽。辞去彭泽令,是陶公忠于晋朝之“义”举,“盖渊明仕于晋祚将移之日,世道人心,皆不可问。而气节学问,无所用之,徒劳何益?五斗折腰之说,有托而逃。”^{[6]13}即便是《桃花源记》的作意,孙毓修也认为是“乃寓意于刘裕,而托之秦耳。”^{[6]21}而其拒绝刘宋当道之徵同样出于对前朝的忠义之心,“陶公见宋王业渐隆,不复肯仕,所著文章,义熙以前,明书晋年号。自永初以来,唯云甲子而已。此有汉陈咸不臣王莽,仍用汉腊之意。忠臣节士,无可如何,乃用此表志,夫亦大可怜矣。”^{[6]18}孙毓修认为,虽然刘裕篡晋,但“潜,始终晋人也。”^{[6]28}并将陶公的忠义与汉人陈咸相类。陈咸,西汉沛国洨人,“平帝时,王莽辅政,多改汉制,咸心非之。”^{[12]1547}后去职归里。“及莽篡位,召咸以为掌寇大夫,谢病不肯应。时三子参、丰、钦皆在位,乃悉令解官,父子相与归乡里,闭门不出,犹用汉家祖腊。人问其故,咸曰:‘我先人岂知王氏腊乎?’其后莽复征咸,遂称病笃。于是乃收敛其家律令书文,皆壁藏之。”^{[12]1547-1548}陈咸忠于汉朝而不就莽征,陶公心许晋室而不受宋位;陈咸将汉家律令藏

之于壁,陶公纪诗不采宋号唯用甲子,先达与后贤之“义”同出一辙——儒家君子之节义观。

其次,孙毓修认为道家自然观是陶公之人格的重要构件。陶公终究未入远公莲社且以酒搪塞之,正是因为其人格建构中的道家自然观,孙毓修对此深有洞悉:“其生平理想,见之于《形影相赠诗》、《神释诗》,大意以世情感于惜生,故极陈形影之苦,而释以神之自然。……‘纵浪打化中,不喜亦不惧。应尽便须尽,无复独多虑。’此乃不易死生祸福动其心,泰然委顺,乃得神之自然。此诚能达生而遗世者也。此岂莲社中人,终日念阿弥陀佛往生净土者所能知哉?”^{[6]21}“达生”是通晓生命之道、人生真谛,亦即泰然为顺、纵浪大化、与自然融一,如此方能“遗世”而不喜不惧、不以死生祸福动其心。宋人施德操云:“达摩未西来,渊明早会禅。”^{[13]3318}施氏所谓的“禅”即是陶公对道家及玄学“自然”观的皈依。陶公真体内充^{[14]7284}、与道冥一,体素储洁^{[14]7285}、净土在心,无修而修、无得而得,莲社中人自然难以理解和企及陶公之“禅”境了。孙毓修同时认为,在“寻阳三隐”中,正由于陶渊明对“自然”观的皈依与执著,“未能谢绝势分”^{[6]23}的周续之和“耽于佛”^{[6]23}的刘遗民,便远远不能与陶公等同并埒。

3. 论陶渊明的酒

古今论陶必言“陶酒”,孙氏陶著也多涉“陶酒”问题,其观点大致如下:

其一,“陶酒”高于“竹林之酒”。叶梦得曾说:“晋人多言饮酒,有至沉醉者,此未必意真在于酒。盖时方艰难,人各惧祸。惟托于醉,可以粗远世故。”^{[15]434}“陶酒”高于竹林之酒,此古今通识。清人宋咸熙言曰:“古之酒人,当以渊明为最,太白次之,若阮籍、刘伶,直是沉酒酣身矣。陶渊明《饮酒》诗,昭明太子所云情不在于众事,寄众事以忘情者也。太白犹有胸中郁勃之气,其不如陶渊明者在此。”^{[16]258}阮籍、刘伶、太白不能超越自我与现实,故其酒带“郁勃之气”。陶渊明却一往真气、冥合天道,带着哲学沉思来饮酒赋诗,故陶酒能“忘情”而达到玄学所追求的高远静穆的境界。

古来学者多从道家哲学与玄学哲学角度解释这一差异,而孙毓修却立足于儒家“忠义”的视角,对陶酒与竹林之酒作以价值评判。“陶公之托于翫蘖、逃于昏冥者,夫岂得与阮籍辈并论!……公乃高举远蹈,不受世纷,而至于躬耕乞食,其忠义亦足现矣。……论者不察,与竹林诸狂士等量齐观,夫岂足与论古者哉。”^{[6]3-4}在孙毓修心中,即便是饮酒,陶渊明也带着忠义的豪侠之气,这绝不是昏昏

冥冥的竹林名士所能比拟的。

其二,陶公之“其醒不可及,其醉尤不可及也。”^{[6]18}醒不可及,尤为可知。醉不可及,颇为费解。萧统最早提出陶渊明“寄酒为迹”^{[17]3067}的观点,所谓“迹”就是人生的一种表象和手段,方宗诚认为是:“托酒以返真还淳,忘怀名利,以了死生。”^[18]对此,孙毓修深入解读曰:“陶公于酒,真所谓神理独契者。集中饮酒诗居多数,但家贫不能长得,更不能得美酒。其所与饮,多田野樵渔之人。班坐林间,兴之所至,别有会心,故不泥乎迹也。……读其《饮酒》二十首,或析名理、或慨时事,迂回往复,寄托深远。夫岂醉人所能?世之醉者,既自以为醒,而醒者遂不得不自以为醉。处此苦境者,古今来独一渊明也哉!”^{[6]16-17}孙毓修深化了前人的观点,但距“真理”仅一步之遥。

实际上,陶公“醉尤不可及”的原因就在于他“以醉致醒”的人生艺术。俗众饮酒,醒以期醉,借以忘怀现实,得以暂时地逃避与快慰。陶公饮酒,以醉致醒,以“酒”为媒介进而思辨宇宙与人生、体悟天道、超越世俗、超越自我,获得精神世界永恒的逍遥游。也正是这种“以醉致醒”的酒德、“酒”艺术,孙毓修对陶公最终未能“去酒”给予充分理解。

4. 论陶渊明教子

陶渊明《命子》等作流露出对孩子的复杂心态,古今学者对此不断地剖析、臆评。针对少年读者,孙氏陶著特撰《训子》一章,对陶公的教子之心作深度剖析。

首先,孙毓修认为陶公对五子有切至的“慈祥恺悌”之怀。孙毓修认为:“陶公高蹈独善,宅志超旷,视世事无可芥其中者,独于诸子,拳拳训诲。”^{[6]27}且“陶公训子最切至,与其平日放旷之怀判若两人。”^{[6]23}萧统《陶渊明传》记载了陶渊明为官彭泽时曾遣力仆助子并特诫其子善遇力仆一事。孙毓修从教育学的独特视角来认知此事:“(陶公)慈祥恺悌,千载下如见其心。以此教子,其意深矣。”^{[6]23}对于陶公之举,钟秀曾曰:“陶渊明……全是民胞物与之胸怀,无一毫薄待斯人之意,恍然见太古,不独亲其亲,不独子其子,景象无他,其能合万物之乐,以为一己之乐者,在于能通万物之情,以为一己之情也。”^{[19]卷四}钟秀的思辨将陶公仁爱之怀提升到理学高度,论断最深刻、最精辟,可谓之中国文化本体视角的终极解读。

其次,匡正后世对陶公教子的误解。

杜甫《遣兴五首》其二云:“陶潜避俗翁,未必能达道。观其著诗篇,颇亦恨枯槁。达生岂是足,莫

识盖不早。有子贤与愚,何其挂怀抱。”^{[20]563}这首诗关乎陶公人与诗的双重问题,无论作者最初的命意是自嘲还是贬斥陶渊明,历史的事实是,杜甫因此招致了后人无尽的反驳与批评。孙毓修同样反驳杜甫的观点。

第一步,孙氏反驳杜甫的论据。杜甫的论点是陶潜未“达道”,而论据即是陶公挂怀于孩子的贤愚。黄庭坚《书陶渊明责子诗后》曰:“观渊明之诗,想见其人,恺悌慈祥戏谑可观也。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肖,而渊明愁叹见于诗,可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。”^{[21]176}黄山谷认为陶公内心“恺悌慈祥”,其著《责子》诗不过“戏谑”耳,而俗人却误读为“诸子不肖、渊明愁叹”,其荒唐犹如痴人信梦。孙毓修发挥黄庭坚的观点进一步反驳道:“盖渊明襟怀旷达,高出尘壒之表。大抵诸郎皆中人之资,期望甚切,稍不满意,遂作贬词。况雍端甫十三,通子方九龄,过庭之训尚浅,可遽以不肖断之耶?”^{[6]25}“诸子不肖、渊明愁叹”之俗见有悖于人情事理,谬论不攻自破。四十年后的1957年,周作人也对此发表看法:“我喜欢读陶渊明诗,有许多篇都很喜欢,其一是《责子》诗……对于此诗,古来有好些人有所批评,其中唯黄山谷跋语说得最好……这里的所谓俗人之中却有一个杜子美。……陶诗题目虽是责子,似乎是很严肃的东西,其实内容是很诙谐的,其第五联最是明了,如果十三岁的小孩真是连六与七还不懂,那么这是道地的白痴,岂止不肖而已。山谷说他戏谑,极能了解这诗的意味,又说慈祥,则又将作者的神气都说出来了。”^{[22]803-804}周作人对杜甫的反驳更委婉了。

第二步,孙氏直接反驳杜甫的论点。孙氏从道家哲学角度立论,他认为“与子一疏,乃陶公毕生实录、全副学问也。穷达寿夭,即一眼觑破。则触处任真,无非天机流行。末以善处兄弟劝勉,亦其至情不容已处。读之惟觉真气盎然。”《与子俨等疏》是陶公一生性情的写照——真气盎然,达于天人合一之境。人生之穷达寿夭,其一眼觑破,全然摆脱。正因此,孙毓修认为:“杜以渊明教子为不达,非笃论也。”^{[6]27}非“笃”即为肤浅,有名士气的孙毓修对杜甫的反驳更为直截而不客气了。

三、结语

柳和成先生在《孙毓修评传》中提出:“‘少年丛书’的读者群定位于小学高年级以上少年。”^{[2]90}客观地说,孙毓修编纂的《陶渊明》虽然是“少年丛书”之一,但还未达到完全的、自觉的“少年化”。浓重学术性淡化了孙本《陶渊明》的故事性,作为少年读

物,其“成人本位”仍未脱尽。与其说向少年介绍陶渊明,不如说与少年谈陶学。一方面,鲜明的学术性自然对少年理解、接受陶渊明产生深化作用,具有积极意义;但另一方面,过于浓重的学术性势必降低了少年读者阅读与接受的兴趣,减少受众数量。

此外,孙氏陶著对陶渊明的文学未能给予必要的关注和介绍。对著作引述的八篇陶作,孙氏所作的都是社会学层面的剖析,以此挖掘陶公的品性与人格。而对陶公开创中国诗歌新风尚、流传千古的田园诗却未置点墨。这很容易导致少年对陶公的一隅之见——陶渊明仅仅是义士、隐士罢了,而非文化与文学的、完整的陶渊明。文学是濡育人类心灵与性情的重要媒介,孙氏陶著对陶渊明文学的忽略,也会使少年的文学熏陶弱化或缺失。这不能不说是孙氏陶著的缺憾。

然而,对于陶学,孙毓修终究功不可没。虽然他以中国文化本位主义的传统方法研究陶渊明,但他对陶学诸多问题所作的深刻思辨和清晰的论证,深化并推动了陶学的发展。孙毓修编撰的《陶渊明》是20世纪最早的陶学著作,孙毓修的陶学研究与建树,客观上引领了20世纪初期陶学的发展。更为重要的是,他为陶渊明的传播开创了新的、特殊的受众类型——少年受众。在陶学史上,孙毓修第一次郑重地把陶渊明介绍给少年儿童、把陶公植入少年心中,完成了黄庭坚所留下的学术课题。客观上,陶渊明的人格自然影响或引导中国少年的成长,提升了国民的素质。而在这个过程中,陶渊明的文化生命力也自然得以生生不息。仅此,孙毓修是20世纪当之无愧的杰出的陶学家。

〔参 考 文 献〕

- [1] 黄庭坚.书陶渊明诗后寄王吉老[M]//全宋文:第106册.上海辞书出版社,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6.
- [2] 柳和成.孙毓修评传[M].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1.

- [3] 茅盾.商务印书馆编译所[M]//茅盾全集:第34册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7.
- [4] 茅盾.关于“儿童文学”[M]//茅盾全集:第20卷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0.
- [5] 周作人.儿童的文学[M]//钟叔河编订.周作人散文全集:第2册.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9.
- [6] 孙毓修编纂.陶渊明[M].上海商务印书馆,1918.
- [7] 朱熹.答刘子澄[M]//晦庵集:卷三十五.文渊阁四库全书本.
- [8] 高建新.自然之子——陶渊明[M].呼和浩特:内蒙古大学出版社,2003.
- [9] 罗宗强.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[M].天津:南开大学出版社,2003.
- [10] 颜真卿.咏陶渊明[M].彭定求等编.全唐诗:卷一五二.北京:中华书局,1960.
- [11] 朱熹.跋颜鲁公栗里诗[M]//晦庵集:卷八十一.文渊阁四库全书本.
- [12] 范晔.郭陈列传[M]//后汉书:卷四十六.北京:中华书局,1996.
- [13] 施德操.北窗炙輠录[M]//吴文治.宋诗话全编:第三册.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8.
- [14] 司空图.二十四诗品[M]//彭定求等编.全唐诗:卷六三四.北京:中华书局,1960.
- [15] 叶梦得.石林诗话[M].何文焕.历代诗话:上册.北京:中华书局,1981.
- [16] 宋咸熙.耐冷谭[M]//北大中文系.陶渊明资料汇编:上册.北京:中华书局,1962.
- [17] 萧统.陶渊明集序[M]//严可均辑.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.北京:中华书局,1995.
- [18] 方宗诚.陶诗真诠[M].柏堂遗书本.
- [19] 钟秀.陶靖节纪事诗品[M].国家图书馆藏清刻本.
- [20] 杜甫.遣兴五首[M]//仇兆鳌.杜诗详注:卷七.北京:中华书局,1979.
- [21] 黄庭坚.书陶渊明责子诗后[M]//全宋文:第106册.上海辞书出版社,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6.
- [22] 周作人.杜少陵与儿女[M]//钟叔河.周作人散文全集:第12册.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9.

(责任编辑:程晓芝)